

福寿康宁慕白傅 高情厚谊敦乡风

——宋代的怡老会

熊海英

在宋代，以宴饮唱和为主要内容的文人雅集非常盛行，几乎成为士大夫群体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集会主题多种多样，如中秋、重阳等节日的文酒诗会，同年、同官、同乡的聚会等，而年高德劭的老人闲官也有专门的聚会，通称为“怡老会”。

所谓怡老会，即是退休官员为怡情适性所举行的群体集会活动，最早开始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时白居易74岁，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履道里第为“九老会”。《新唐书·白居易传》云：

尝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绘为“九老图”。

其中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故一称“七老会”。关于此次集会，白居易有诗云：“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诗

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巍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天年高过二疏傅，人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更应无。”（白居易《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予亦次焉偶于弊居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记之传好事者》，《全唐诗》卷四六〇）此外还有题画之《九老图诗》。

白居易的老人闲官聚会在唐代不见继踵者，宋人却纷纷效仿，虽冠以九老会、五老会、同甲会、真率会等不同名称，但却具有相同的怡老性质。

据欧阳光《宋元诗社研究丛稿》梳理统计，仅北宋怡老会就有李昉的汴京九老会（未举行），徐佑的苏州九老会，马寻的吴兴六老会，杜衍的睢阳五老会，章岣的苏州九老会，文彦博的洛阳五老会、耆英会和同甲会，司马光的洛阳真率会等九会（参见欧阳光著：《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为其所疏漏的还有：杨咸章

与任杰、杨损之、杨武仲的“四老会”(《樊安寺内浣溪四老唱和诗并序》,见《全宋诗》卷六八九)孔嗣宗等在洛阳的“穷九老会”(文彦博:《前朔宪孔嗣宗太博过孟云近于洛下结穷九老会凡职事稍重生事稍丰者不得与会其宴集之式率称其名其事诚可嘉尚其语多资咻嘘因作小诗以记之亦以见河南士人有名教之乐简贪薄之风辄录呈留守宣徽聊资解颐》,《全宋诗》卷二七六)等。各会集次又多少不等,如苏州章帖任内至少有元丰四年“九老会”和元丰八年“十老会”两次集会,文彦博洛阳耆英会参与者十三人次第为会,司马光洛阳真率会亦举行过不止一次,每次参加者略有出入。

还有更多老人闲官的聚会不以怡老会为名,而其实质与怡老会无异,如石中立退休后,与“中大夫程公浚、吏公瑜”;庞眉鹤发,安车相往还。燕喜赓唱,里人敬之,号‘三卿’”(吕陶:《中大夫致仕石公墓志铭》,《净德集》卷二二);又“正献公守颖时,赵康靖公概自南京访欧阳公于颖,与公二人会,燕于欧阳公第,因其名堂曰‘会老’。后公守河阳,司马文正公、范忠文公自洛来访,因名所馆曰‘礼贤’。是二会皆有歌诗乐语盛传人世”(〔宋〕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上)。兹不尽举。

怡老会是闲官老人们为了更好地享受赋老归闲的逸趣而举行的,而在传统观念中,高年耆寿是国之祥瑞、太平的象征,耆年聚会更是一方希阔之盛事,故这项活动也是士大夫们为心

中百年不遇的盛世锦上添花。此外,无论仕宦,还是乡居,士大夫始终以推行儒家伦理教化为职责,即使在这种颐养天年的结社中,仍有推行儒家礼仪的教化意义。如司马光“真率会”约定每会“果实不过三,肴饌不过五品,酒则无算”(《吕氏杂记》卷下);文潞公求附名于其间,温公为其贵显而弗纳”(丁传靖:《宋人轶事外编》卷九),故范纯仁赋诗云:“贤者规模众所尊,屏除外饰贵全真。盖簪既屡宜从简,为具虽疏不愧贫。免事献酬修末节,都将诚实奉嘉宾。岂惟同志欣相照,清约尤能化后人。”(范纯仁:《和文太师真率会》,《全宋诗》卷六二四)文彦博也认为孔嗣宗等“穷九老会”可以彰显“河南士人有名教之乐、简贪薄之风”。每当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老人宴集于名园古刹、水竹林亭之时,人们随而观之,自然产生一种“敦契谊、崇齿德,畅涵郁,而示乡人以礼也”的表率作用。

几乎历次怡老会上产生的诗作或后人的追叙都指出集会动机是“思继白少傅九老之会”,“慕唐白乐天九老会”;“继会昌洛中故事,作九老会”。从集会的参与主体来看,都是闲官老人;相处方式亦“用洛中旧俗,序齿不尚官”;集会的主要活动都是诗酒唱和,吟醉相欢,有的怡老会还步趋白居易九老会,将集会老人形于图画;怡老会诗作的气味、主旨甚至词句表达与白诗颇为相似,一般首叙年寿,次称勋德,再抒闲适之情,如“五老会”杜衍诗云:“五人四百有余岁,俱称分曹与



会昌九老图 佚名作品

挂冠。”“同甲会”文彦博诗曰：“四人三百二十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园为赋客，合成商岭采芝仙。”所有怡老会的参与者都表达了与白居易相同的感受——“此会从来诚未有”，希望它会“高名千古映湖山”。此外为集会诗歌所作之序和笔记对怡老会事迹的记载也都详细罗列参与者姓名、官爵、年龄，赞美集会参加者德寿俱高，以为真乃太平盛事，足以传之后世。可见宋代怡老会完全是对白居易“九老会”亦步亦趋的模仿。

为什么白居易“九老会”在宋代会引起歆羡，被群起效仿？它说明北宋文人士大夫群体对白居易“九老会”传达的价值观非常认同和接受。

从地理位置上看，怡老会多在洛阳和江南苏、杭一带举行，这些都是与白居易颇有渊源的所在。闲官老人的居处和怡老会举行地点的共同特点是：“谓近隔城市，谓远非山林。”因为“山林多寂寞，都市太奔忙。不似安车老，优游适四方”（范纯仁：《和王太中游乐述怀》，《全宋诗》卷六二二），这正是接受了白居易的“中隐”思想，所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白居易《中隐》，《全唐诗》卷四四五）。参

加集会的退休大臣、地方缙绅生活优裕，家世殷实，其杯酒光景、吟醉相欢的生活作风和境遇与白居易晚年很接近，思想上也与白居易乐天知命、知足保和的人生旨趣有相通之处。

怡老会的参加者们希望这样的集会能“以声诗流咏播于无穷”，“愿凭绘事永传看”，不为别的，是相信他们这样集于一身的富贵、贤德和高寿亦是众人所艳羡的，怡老会好比一朵福祿寿三喜并蒂的富丽繁花，将在众人艳羡的目光和传说中永生。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如杜衍睢阳“五老会”上所绘《睢阳五老图》，除五老本人之外，在北宋得到欧阳修、晏殊、范仲淹、胡瑗、邵雍、苏颂、苏轼、张商英等18人的次韵题咏，南宋则有朱熹、张贵谟等人的题咏。人们观看《九老图》、《五老图》或其他怡老会画图时，想象着文人官僚福寿康宁的理想人生历程，不由地引发出由衷的倾慕之情。怡老会上的留影不仅是画像而已，它还是所有学而优则仕者憧憬的人生蓝图。

宋代怡老会的盛行也鲜明体现了自唐代以来即出现的文人集会重心不断下移的趋势，无论是集会地点，还是参与主体的身份都显示了这一特点。这些次数既多、影响又大的怡老集会都在洛阳、睢阳、吴兴、苏州等地方举

行,参与集会的文人群体身为闲官、致仕官员或乡绅,共同特点是离开京城政治中心,与朝政事物疏离,处于在野状态。举行怡老会最多的洛阳,在熙宁、元丰年间,成为这类文人士大夫群体聚集的中心,如退休的文彦博、富弼、范镇,被冷落的司马光、范纯仁,当地贤达邵雍、二程等,他们表面过着“相逢各白首,共坐多清谈”的优哉游哉的生活,却也关心着朝廷,内心不乏要对朝政发挥影响力的强烈愿望,只不过因为神宗和王安石决心变法,使他们暂时失去了发言权,其状态正是白居易所说的“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因此“洛中士大夫贤而老自逸者”的集会不仅是高寿、贤德、富贵的花开满堂,也是与中央朝廷相对的在野文人士大夫群体整合思想、文化、政治资源的重要场合。

再从章帖苏州九老会、十老会的参加者来看,他们有的是致仕后侨寄苏州之衣冠,有的是世代居吴之缙绅。这些人因姻戚、同年、师生、好友等关系在当地形成一个群体,相互之间交往密切,如元绁与程师孟“交契最密,又同还里第”,章帖亦“平昔僚旧”,和洛阳士大夫群体一样,他们上与朝廷、下与民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能量与影响力是每一个在职的地方官员甚至朝廷都不能轻视的。

由此看来,以集会参与者的高贵身份和高情逸趣为人艳羡的宋代怡老会其实不仅仅是老人闲官悠游唱和、以相娱乐的聚会,同时也是这一文人士大夫群体透过各个层面进行人际交

往、互通信息、交流思想,从而对地方风俗甚至朝廷政治发生影响的功能场合。

怡老会在宋代的盛行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时代风气和物质条件。宋朝开国后,为巩固统治,不久即“杯酒释兵权”,太祖命石守信等“多集金帛,歌儿舞女终其天年”,主观上虽是为了巩固皇位采取的措施,客观上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一种极娱心态的提倡和鼓励。又终宋之朝,实行文治,太宗、真宗而下到南宋,皇帝亦多好文艺,喜游宴,故朝廷曲宴游赏极多,蔚然成风,可想而知。

不管集会如何简朴从事,总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支持的,从大背景来看,宋代比前代经济更加发达,城市和工商业繁荣,民间富庶,物质享受十分丰富,《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多种笔记都有记载。就集会参与者本身而言,宋朝对文臣士大夫十分优遇,不但官俸比较优厚,且大臣致仕后能够以领宫观的名义继续得到俸禄,这又为怡老会的常常举行提供了物质保障。

总之,整个宋朝虽有外患,但国内始终维持了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文人阶层处境较为宽松,这使得他们有闲暇、有财力、能够心理轻松地进行群体娱乐休闲活动,怡老会盛行就是突出现象之一。而宋代“怡老会”在伦理、政治、心理、文化等方面的深层内涵和影响还是值得今天的我们继续探索、领悟乃至借鉴的。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中文系)